

农民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成艾华,田嘉莉

(中南民族大学 中科院国家民委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与开发联合实验室 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 要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城镇化就需要尊重其利益主体——农民的主观意愿。基于武陵山片区的田野调查数据,在控制个体人口统计特征因素的情形下,采用 probit 模型并考虑“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综合考察了农民市民化意愿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在(预期)收入方面,预期收入增加是农民愿意迁居城市最重要的动因,而当前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则因其来源不同而不同,即当收入主要来源于非农业生产时其效应为正,反之则有迁居意愿;在(预期)成本方面,与迁居相关的住房获得成本以及子女教育获得成本都有不可忽视的显著影响。

关键词: 农民; 市民化意愿; 城镇化; 决定因素; Probit 模型

中图分类号: C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3X(2014)01-0133-05

统计数据显示 2012 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为 52% ,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 35% ,其中 17% 属于以农民工为代表的非城镇户籍,这就是当前我国城镇化的典型特征——“半城镇化”: 户籍在农村,就业在城市; 家属在农村,劳力在城市; 积累在农村,收入在城市; 根基在农村,生活在城市(辜胜阻, 2013)。显然,“半城镇化”的社会代价是巨大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到“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那么,在城镇化过程中作为主要群体的农民其市民化意愿具体如何? 农民的这些意愿受哪些因素影响? 农民是城镇化进程的最终实施主体,其积极性和主动性情况将直接决定我国城镇化进程的速度和质量,而政府政策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吸引农民自愿从农村走进城市。基于上述思考,结合来自武陵山片区的田野调查数据,通过考察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的意愿情况,并分析影响他们迁居落户城市的决定因素,以揭示我国农村城镇化的微观基础。

一、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的研究中,基于早期劳动力迁移理论提出的“迁移法则”,Lee 把影响迁移决策的因素分为推力和拉力两类^[1]。其中,推力是指促使迁移者离开原住地的负向因素,拉力则是吸引迁移者流向某些特定目的地的正向因素,迁移行为就是这两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与 Lee 注重定性分析不同, Lewis 在其经典

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模型,动态考察了劳动力迁移的经济动因,认为劳动力流动主要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的差异^[2]。虽然 Lewis 创立的“二元经济”模型为研究乡村人口迁移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但其模型是建立在充分就业的假设之上。随着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而城乡人口流动仍然有增无减, Lewis 的模型却无法对此现象给予有力的回应。在此背景下, Todaro 对 Lewis 的模型进行了修正,提出了自己的人口流动模型,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益”最大化目标作出的^[3]。可能是为了分析的简化,在“二元经济”模型中,发展经济学家仅仅考虑了迁移的机会成本(即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与“二元经济”模型不同,在 Sjaastad 提出的“成本-收益”理论^[4]中,成本既包括货币成本也包括非货币成本,前者如交通费用、教育或培训费用、行政费用以及在迁入地寻找住房和职业所需的开支等(Rothenberg^[5] Lopez and Schiff^[6])。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早期的研究一般都把个人视为一种独立的存在,忽视了个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作为一种完善,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开始尝试把群体(如家庭、家族、社群等)中的个体内在联系纳入到传统的迁移理论,开始考察社会资本(Schiff^[7])、信息不对称(Stark^[8])等因素对迁移决策的影响。

收稿日期: 2013-09-25

基金项目: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NCET-12-0669)。

作者简介: 成艾华,男,中南民族大学教授,主要研究城市与区域管理。E-mail: chengaihua2744@163.com

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则表现为两个特点:一是基于国外不同的劳动力迁移理论主要以经验分析为主;二是更多关注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而针对农民市民化意愿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从现有大量的研究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主流文献看,较为一致的结论是农民工个体特征、区域特征、社会资本以及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或制度约束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影响因素^[9]。

至于农民市民化意愿的研究,王桂新等较早地探讨了这一问题,不过其研究仅仅考察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以及家庭规模等个体因素对农民城镇化意愿的影响^[10]。在后续的同类研究中,大部分学者和王桂新等一样,都是以我国的发达地区为考察的目的地,不同的是其研究对象、分析方法和(或)纳入到分析中的相关因素等可能存在差异。例如王华等分别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和因子分析方法,基于“预期收益”的研究视角,考察了广州市郊区农民的市民化意愿问题^[11]。吴秀敏等则选择了成都市的郊区农民作为研究对象。其实证结果显示,农户的迁移决策受到户主的学历、职业类型、家庭是否有学龄儿童、人均耕地面积、交通状况、外出劳动力比例、本地非农就业机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12]。李永友和徐楠则在个体因素之外还把制度性因素纳入到了他们的分析之中。他们的研究结论是,相对于个体特征,征地程序安排、征地补偿以及就业安置等制度因素对浙江富阳等失地农民的市民化意愿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13]。罗明忠针对广东省已进城入户农民的研究表明,在农民进城的通道打通后,影响农民进城的决策因素主要包括经济性因素、家庭性因素、社会性因素和心理性因素等,而且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落户城镇的农民来源地差异明显^[14]。与罗明忠类似,蒋乃华和封进也关注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户进城意愿的影响,不同的是他们关注的是农民户籍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以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等三类不同地区为调研对象,蒋乃华和封进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地区的农户进城意愿不同,而且影响他们进城意愿的主要因素也存在差别^[15]。

现有国内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如以发达地区农民为研究对象,而对欠发达地区的研究依然较少;以定性分析为主,而定量分析还相对较少。即使在有限的实证分析中,部分文献甚至没有把收入因素纳入其中,而考虑“预期收益”则更少。本研究注重以欠发达地区农户为研究对象,以弥补部分遗憾。此外,基于现有主流人口迁移理论,在控制个体人口统计特征因素

的情形下,主要围绕“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等综合考察农民市民化意愿的决定因素。

二、分析框架、方法及数据

(一) 分析框架。

正如前面所述, Lewis 著名的“二元经济”模型为研究乡村人口迁移奠定了重要的微观基础。虽然 Lewis 研究的主旨是探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但其理论的影响还是无处不在。甚至可以说,后续人口迁移的相关研究都是建构在 Lewis 工作的基础之上。如 Todaro 的人口流动模型强调的是收入不确定性, Sjaastad 的“成本-收益”理论则除收益因素之外既强调了成本因素同时还强调了二者的货币和非货币属性,而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的“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则强调了个人决策所涉及的社会关联因素。因此,对于这些模型的一个基本认识是,这些理论都是对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国际一体化过程人口迁移现象的一种抽象和概括,其核心是收入差异决定劳动力的流动。

从理论上讲,与国外相比,中国人口迁移或市民化现象的基本内在动因并无不同,其决策都是基于其预期的所得和所失之间的考量和权衡。在“预期成本”一定的条件下,如果农村家庭预计能在城市获得高于现有收入的、稳定的非农收入,则“预期收益”较高,进城的意愿也较强;反之则意愿微弱。因此,在不作个人“预期成本”假定的前提下,“预期收益”与进城意愿的含义基本等价。但需要注意的是,从内在涵义看,市民化意愿指的是农民对进城入户“利”与“弊”计算的一种复杂心理活动结果。这种判断不仅取决于农民自身各种条件,同时还受到外部环境及制度等各种因素的约束。而从中国的情形看,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以及城乡制度安排等,相比于发达国家,可能存在一些特殊因素对农民进城入户意愿产生影响。基于此,本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借鉴现有主流人口迁移理论,紧扣“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等两个方面综合考察农民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

(二) 模型及变量选取。

本研究所考察的农民市民化意愿,指的是农户是否愿意放弃农村生活而选择进入城市定居并从事非农业工作。笔者把农民的意愿作为因变量。显然,农民的市民化意愿有两种可能,要么愿意,要么不愿意,即农民的市民化意愿是一个“0-1”二值变量。由于农民的意愿有两个取值,笔者把愿意进城定义为 1,把不愿意定义为 0。当被解释变量为二值变量时,相对于线性概率模型, probit 模型和 logit 模型等具有更好的统计性

质。和许多经济学倾向于随机干扰项的正态假定一样,本文选用的方法是 probit 模型。该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P(y|x) = F(\beta_0 + \beta_1x_1 + \cdots + \beta_kx_k) \quad (1)$$

其中 P 表示农户愿意进城落户的概率; $F(\cdot)$ 为标准正态的累积分布函数; k 是影响这一概率的因素个数; 自变量 x_i 则表示第种影响因素。

至于解释变量,主要是围绕“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两个层面选取影响农民市民化意愿的主要因素。具体地讲,本研究选取影响农民市民化意愿的主要因素有三类。在“预期收益”层面,主要考虑了农户的当前收入水平(inc)以及对进城入户后收入增长程度的预期($exp-inc-inc$)。同时,当前收入水平可能由于其收入来源($sou-inc$)不同其影响也可能不同,笔者对此也进行了考虑。在“预期成本”层面,农户的居住以及子女问题无疑是最需要关注的。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强调需要自己的住房而非选择租房的家庭比例高达 85.9%。因此,在“预期成本”层面上,笔者选择的变量主要包括户主对进城入户后住房可获得性($ava-hou$)以及子女教育可获得性($ava-chi-edu$)等主观预期和判断。此外,笔者还选取了农村家庭户主的相关主要人口统计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包括户主的年龄(age)、教育程度(edu)、家庭规模($fam-siz$)以及城市生活经验($exp-cit-lif$)等 4 种因素。要说明的是,考虑到国家规定的劳动就业年龄为 16-60 岁以及农户实际选择迁居的可能性,笔者把受访农户户主的年

龄控制在 25-55 岁。

(三) 调查数据说明。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 2013 年 7 月笔者组织的针对湖北省鹤峰县农村城镇化问题所作的调研。鹤峰县属于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先后被定为国家一类老区县、全国新一轮扶贫开发重点县、农业部定点扶贫县、全省脱贫奔小康试点县。由于鹤峰县地广人稀,因此实地调查采用了代表抽样的方法。具体做法是:按人均收入水平对该县的所有乡镇进行排序,并以此为依据把所有乡镇划分为高中低三类;在每一类乡镇中随机抽取一个样本乡镇;在每一个样本乡镇随机抽取三个样本村,并在样本村选择 40 户进行入户调查。调查问卷包含三部分:一是受访农户基本情况,二是受访农户的生活及工作情况,三是受访农户户主的迁居要求及意愿。为了确保调查数据的有效性,调查问卷中所包含的各类问题的设问简洁明了,对个别重要的问题运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反复的设问,同时依照一贯性标准使调查的问题在逻辑上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在调查问卷中,对农户家庭月平均收入的调查包括 1000 元以下、1000-4000 元、4000-7000 元、7000-10000 元以及 10000 元以上等 5 个选项。在实证分析中,我们对此的处理是,以户主所选项的组中值代表其家庭月平均收入。调研结束后,全部共回收 360 份问卷,在舍弃具有缺失值以及其他问题的问卷后,最后所获取的有效问卷为 329 份。表 3-1 列示了本研究相关变量的名称、定义以及简单的统计描述。

表 1 变量解释及描述

变量	含义	Mean	Min	Max
y	受访农户户主是否愿意迁居并落户城镇:愿意=1 不愿意=0	.608	0	1
age	受访农户户主的年龄	39.812	25	25
edu	户主教育年限:小学及以下=6 初中=9 高中=12 本科及以上=16	9.943	6	16
$fam-siz$	受访农户家庭成员数	3.995	2	6
$exp-cit-lif$	户主是否有一年及以上的城市生活经验:有=1 没有=0	.294	0	1
inc	受访农户当前月平均家庭收入	2355.349	500	12000
$sou-inc$	受访农户家庭收入来源类型:农业收入为主=1 反之为 0	.468	0	1
$exp-inc-inc$	如进城,户主对收入增加与否的判断:增加或增加很多=1 反之为 0	.435	0	1
$ava-hou$	户主对城市住房可获得性的判断:非常困难或困难=1 反之为 0	.669	0	1
$ava-chi-edu$	户主对子女教育可获得性的判断:非常困难或困难=1 反之为 0	.510	0	1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针对式(1)采用 probit 模型方法,笔者将紧扣“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等两个方面,综合考察农民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在实际操作中,笔者利用表 2 中的模型 1 首先直接考察了当前收入水平、收入增长程度预期、住房可获得性、子女教育可获得性以及户主人

口统计特征因素等对农户市民化意愿的具体影响。然后,笔者利用模型 2 理清了不同来源属性(是农业生产为主还是以非农业生产为主)对当前收入的不同影响。其中,模型 2 的具体做法是,在模型 1 中引入了当前收入变量(inc)与收入来源虚拟变量($sou-inc$)的乘积。运用统计软件 Stata12.0,笔者把估计所得到的结果列

示在表2中。

表2 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①

解释变量	系数(标准误)	
	模型1	模型2
<i>age</i>	-.0555*** (.0182)	-.0577*** (.0188)
<i>edu</i>	-.2809 (.1923)	-.3357 (.1969)
<i>fam - siz</i>	.0920 (.1364)	.1534 (.1433)
<i>exp - cit - lif</i>	.1104 (.2759)	.0543 (.2809)
<i>ava - hou</i>	-.0172* (.2638)	-.1142* (.2772)
<i>ava - chi - edu</i>	-.0702* (.2500)	-.1101* (.2545)
<i>exp - inc - inc</i>	.6945*** (.2524)	.5306*** (.2647)
<i>inc</i>	.000076* (.0000)	.0001029** (.0000)
<i>inc × sou - inc</i>		-.0001565* (.0001)
观测值	329	329
Pseudo R ²	0.0015	0.0006
Prob > chi2	0.1443	0.1693

注:***、**、* 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括号里为系数的标准误。

基于表2的估计结果,笔者发现:第一,在人口统计特征因素中,仅户主的年龄因素对其市民化意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户主的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城市生活经验等因素的影响不显著。户主的年龄越大越不愿意迁居,这与现有大部分文献的观点一致。至于原因,可能是因为年龄越大,不仅可能导致其工作竞争力越低,还可能在于其迁移的(非货币)成本更高。家庭规模因素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由于样本中农户家庭规模的差异并不大。城市生活经验因素的影响不显著,则可能与城市就业虽然给农民带来更高的收入,但其实际体验因城市生活条件有限、歧视等而欠佳有关。在结果中,户主教育程度的影响不仅不显著而且为负,这和笔者的事前预测不一致。笔者估计,这可能与农民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样本均值为9.943年)有关。

第二,在迁居的“预期成本”因素中,住房可获得性以及子女教育可获得性等两个变量对农民市民化意愿都有显著的、负面的效应。这一发现与笔者的事前预计一致。毕竟子女教育问题是包括农民家庭在内的所有中国家庭所关心和所看重的,而如果“居无定所”则将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

第三,在迁居的“预期收益”因素中,收入增长程度预期因素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当前收入水平因素的影响却因其收入来源属性而不同。笔者的这一发现,

不仅是对现有人口迁移理论的一个印证,而且还可以视为一种补充。在人口迁移理论中,学者们强调了迁移发生的必要条件之一是预期收益需要超过现有收入水平。在本研究中,收入增长程度预期因素的显著正效应对此结论给予了经验支持。另一方面,人口迁移理论强调预期收益与现有收入水平差额为正,说明学者们关注的是现有收入对农户迁移的负面影响。但如果考虑到现实中存在的实际约束条件,农户当前收入对其市民化意愿可能存在正面的影响。例如在信贷市场不完善的情形下,更高的当前收入可能有利于农户迁居。在模型2中,当前收入变量与收入来源虚拟变量的乘积——即变量 $inc \times sou - inc$ ——的系数为-.0001565,其绝对值大于前收入变量(inc)的系数.0001029。这意味着,当农户的当前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时,当前收入越高,农户越不倾向移居城市;反之则倾向迁居。

在考察了哪些因素对农民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之外,笔者感兴趣的另一个问题是,这些因素的具体影响又是如何?

二值响应模型中,解释变量对受限因变量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即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随每个解释变量变动而连续变化。为了考察影响农民市民化意愿显著因素的具体边际效应,针对模型2,利用stata中的mfx命令,笔者把显著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计算结果显示

① 在回归结果中,解释变量edu的系数为负(不过并不显著)与一般的预计不同。因此,我们怀疑这两个模型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利用stata中collin命令,诊断发现变量edu的的方差膨胀因子分别为2.27和2.14,而其他解释变量的VIF值都在1.0-2.0之间,所以我认为这两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考虑文章篇幅,我们没有报告具体的诊断结果)。

于表 3。

表 3 农民市民化意愿决定因素的边际效应(基于表 4 - 1 模型 2 中的显著因素)

解释变量	<i>age</i>	<i>ava - hou</i>	<i>ava - chi - edu</i>	<i>exp - inc - inc</i>	<i>inc</i>	<i>inc × sou - inc</i>
边际效应	-.0218	-.0428	-.0415	.1969	.000039	-.000059

注: 边际效应计算以解释变量均值(虚拟变量为 0) 为基准。

第四 在所有显著影响因素中 ,收入增长程度预期 ($exp - inc - inc$) 的边际影响最大。这也是基于表 4 - 2 的一个实证发现。

当预期到进城入户后收入会提高或提高很多时 ,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形下 农民愿意迁居的概率将提高 19.69%。此一类值得注意的影响因素是住房可获得性和子女教育可获得性。当每年预期到所在城市购买自住房或子女接受教育等方面存在困难或非常困难时 ,其愿意迁居的概率将分别降低 4.28% 和 4.15%。而当前收入水平则因其来源不同而影响不同。以当前收入为样本均值水平(2355.35 元) 的家庭为例 当收入主要来源于非农业生产时 ,当前家庭月平均收入增加 100 元 农民愿意迁居的概率将提高 0.39%; 相反 当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时 ,当前家庭月平均收入增加 100 元 农民愿意迁居的概率将下降 0.20%。

四、结论和政策含义

参考文献:

[1] Lee E S. A Theory of Migration [J] . Emography , 1966 (1) .
[2] Lewis W Arthur.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M] .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 1954: 22.
[3] Todaro , Michael P.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J] .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1969(59) .
[4] Sjaastad L A. The Costs and Returns of Human Migration [J]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1962(70) .
[5] Rothenberg J. On the Microeconomics of Internal Migration [M] // Brown A A , Neuberger E. Internal Migrati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 San Francisco / London: Academic Press , 1977: 183 - 205.
[6] Lopez R , Schiff M. Migration and Skill Composition of the Labor Force: the Impact of Trade Liberalis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 . The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 1995: 1493.
[7] Schiff M. Labor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Social Capital [M] . The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 1999: 2222.
[8] Stark O. The Migration of Labor [M] .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9] 王桂新 陈冠春 魏星.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考察: 以上

市民化意愿指的是农民对进城入户“利”与“弊”进行价值判断和取舍的结果。在笔者的田野调查中 ,对农民“总的来说 您是否愿意迁居落户到城镇”的调查显示 回答“愿意”的比例为 60.8%。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 (1) 预期收入增加是农民愿意迁居城市最重要的动因。因此 促进农民非农业生产技能的积累和提高、增加农民的城市就业机会以及深化农村土地改革、提高农民的工资水平等是政府部门最为重要的工作。(2) 由于当前家庭收入的影响因其来源不同而不同 因此从提高农民生活品质、加快城镇化进程的角度讲 即使在农村 政府也应该致力于重点从非农业生产的相关途径制定农民增收的相关政策和措施。(3) 住房以及子女教育等既是农民所关心的 ,同时也是农民难以克服的问题。相应的 政府需要在居住以及教育等社会公共服务领域付诸有效的行动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海市为例 [J] . 人口与发展 2010(2) . 王春兰 , 丁金宏. 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J] . 南方人口 2007(1) . 梅建明. 进城农民的“农民市民化”意愿考察——对武汉市 782 名进城务工农民的调查分析 [J] .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2006(11) . 黄祖辉. 进城农民在城镇生活的稳定性及市民化意愿 [J] . 中国人口科学 2004 (2) . 祝军. 从生存到尊严: 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维度 [J] . 江汉论坛 2013(8) .
[10] 王桂新 高慧 徐伟 等. 发达地区农村人口城市化个人影响因素的分析——以浙江省柯桥、柳市两镇为例 [J] . 人口研究 2001(1) .
[11] 王华 彭华. 城市化进程中郊区农民迁移意愿模型——对广州的实证研究 [J] . 地理科学 2009(1) . 王华. 广州城市化进程中郊区农民迁移意愿分析 [J] .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09(2) .
[12] 吴秀敏 林坚 刘万利. 城市化进程中西部地区农户的迁移意愿分析——对成都市农户的实证研究 [J] . 中国农村经济 2005(4) .
[13] 李永友 徐楠. 个体特征、制度性因素与失地农民市民化: 基于浙江省富阳等地调查数据的实证考察 [J] . 管理世界 2011(1) .
[14] 罗明忠. 广东农民进城决策因素与群体特征分析 [J] . 岭南学刊 , 2012(1) .
[15] 蒋乃华 封进. 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意愿考察——对江苏的实证分析 [J] . 管理世界 2002 (2) .

(责任编辑 彭建军)